

家乡的事

——从一座村庄，几个农民看一代伟人

谭 楷

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从这块土地往北二百里是朱德元帅的故乡仪陇县；往东二百里是刘伯承元帅的故乡开县；往南二百里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江津县；往西南二百多里是陈毅元帅的故乡乐至县；往西百余里是罗瑞卿大将的故乡南充县。四位元帅一位大将的故乡，地图上五个小圆点，一连线可画出一个五角星。值得自豪的巴蜀大地，以这巨大的五角星辉耀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让巴蜀大地双倍自豪的是，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县恰好在五角星的中心。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邓家老院子。牌坊村，是大清国时矗立过一座德政牌坊而得名。如今，在通往协兴的宽阔公路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牌坊，牌坊上镌刻着广安农民两句极其朴实的话：

翻身不忘毛泽东 致富更思邓小平

广安人怎不思念小平。那是 1919 年，少年小平沿着协兴镇那条被骡马踩踏得坑坑洼洼的石板路，走向县城，登上东门码头的一条运粮船，在高亢的川江号子声中去了重庆。滚滚渠江水，巍巍华蓥山送走了仅仅十五岁的儿子。以后，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投身革命，直到成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十五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1988 年大年初二，我见到小平同志的么舅淡以兴老人，我问这位仅比小平大三岁的么舅，晚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老人家说：“喊‘贤娃儿’回来得！回来跟大家一起过个年嘛。”

家乡人民思念小平，盼望小平回故里，已经盼了八十五年！

2004 年春天，邓小平纪念馆园区内秀木拥翠，鲜花盛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频频来到纪念园内，给广安的父老乡亲一个明确的信号：8 月 22 日，小平同志百岁生日那天，将有中央领导人为小平同志塑像揭幕——盼了八十五年，小平同志终于回来了！

乡亲们将会在一片茂林修竹中，看到脚踏故乡热土，面带微笑的小平。他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父老乡亲，那神情就像在故乡的小路上相遇，亲切地跟乡亲们打招呼。

他曾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仿佛听见乡亲们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小平，小平，你回故乡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呵！

广安人民为什么对小平同志满怀深情？四百多万广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为”。

从 1988 年春节到 2004 年春节，十六年来我数次来到广安。我感到，空洞而廉价的颂歌对于小平同志都是浅薄的。发生在广安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巨变是中国巨变的缩影，也是小平丰功伟绩的组成部分。深情的颂歌，沸腾在平民的热血中，不朽的丰碑，矗立在百姓的心坎上。

无言的梧桐树

1988年4月，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的记者”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去广安县，为他的新著《新长征》搜集素材。那时，从成都到广安不但没有高速公路，狭窄的公路上尽是坑坑洼洼。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索老才来到广安。老县城狭窄的街道，拥挤着刚吃饱肚子的农民，他们背着背篓挑着箩筐卖点蔬菜瓜果，买点日用品。索尔兹伯里写道：“四川省是中国的农村，广安是农村中的农村。广安是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我问接待索老的杨文安副县长，索老采访了县委门口那几棵梧桐树吗？答曰：没有。我以为，他没有采访那几棵梧桐树，是件憾事。

八棵伟岸的梧桐树，矗立在广安县大门口。步入树下，那一丛参天翠色，一片覆地清荫使人感到神清气爽。县委书记罗国兴对我说：“你看，树皮是黑的，十二年风雨也未洗去树皮上的沥青。”

原来，梧桐树是1976年的广安大饥饿的幸存者，历史的见证人。

1976年“四五”之后，“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将矛头直指邓小平，远离北京的小平故乡早已处于动乱之中。

头一年，川东伏旱，广安灾情严重，粮食减产七千万斤。“荒月”（旧历二月）一过，饥民便陆续拥向县城，那一张张菜色的脸向县委传递了惊人信息：瓦店的农民在吃野菜了！观阁的农民在挖观音土了……春耕在即，每天有成百上千饥民外出讨口，这使得县委的头儿们坐卧不安。当时的县委书记杨钟（后来曾任国家林业部部长）决定将县上的干部分成五个组，分别去到县境内的双河、禄市、观阁、旺溪和前锋五个火车站去劝阻饥民，不

要外流，向他们宣传“救济粮就要运到了！”

最乱要数前锋站。长长的货车像一条死蛇躺在那里，饥民挤满了每节车厢。

十万饥民出外乞讨，所经之处，如飞蝗过境，剥树皮拔草根，势不可当。广安二中和县武装部大门口的梧桐树皮先后被饥民剥去（梧桐树皮炕干之后打磨成粉，和上野菜，是一种代食品），使得县委一班人更加紧张，因为县委大门口那十几棵高大的青皮梧桐树太惹人眼。若是高悬着“中国共产党广安县委员会”大吊牌的县委大门口的梧桐树也被饥民剥了皮，该造成多坏的政治影响！于是，县委的工人将梧桐树干全刷上又黑又臭的沥青。

那天，杨钟带的一班人从前锋车站归来时，一个个都傻了眼：有八棵刷了沥青的梧桐树也被剥了皮！青幽幽的光滑树皮硬被刀剥手撕去，露出森森白骨般的木质，淌着透明的树汁，那伸向碧霄的枝丫仿佛在痛苦呼喊：天哪——！

刷上沥青的树皮竟也被饥民剥去吃了！

被剥了皮的梧桐树不久便枯死。十二年风雨，无论怎么洗刷，那幸存的梧桐树树干上的黑色仍无法褪去。它们自然成为历史的坐标。

1988年春节前夕，我初次到广安采访时，曾在梧桐树下流连。飒飒风声里，似能听到火车凄厉的长鸣，饥民们的呻吟声，我默默为那些在饥饿年代里冤死的农民兄弟祈祷。

大年初一，县委大门口鞭炮齐鸣，金龙腾跃，四乡农民耍着龙灯，舞着狮子，向县委领导拜年来了。花花绿绿的太空服、羽绒衫翻腾着一条五彩河，一张张红润的脸带着醉心的笑。农民的舞步是粗放雄健的，踩着炸耳的鼓声，把一条条龙舞得翻江倒海。连梧桐树也激动得在鼓乐声中颤抖。

邓家老院子

1988年大年初一清晨，晓雾未散，我登车离开广安县城，到协兴区牌坊村第一次去参观邓小平同志旧居，老百姓叫它邓家老院子。

车出北门，眼前豁然开朗。公路下面，有一条江流淌在灰蒙蒙的薄雾中。隆冬时节，水低石出，满江怪石如虎踞。从这里溯江而上，有三十六道险滩，人称四九滩。江上有木船可通重庆。这就是送走邓小平的渠江。

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的邓小平旧居，是一座绿竹掩映的农家三合院。青瓦屋顶，绿苔斑斑；泥抹粉墙，水痕隐隐。堂屋门额上悬挂的“邓小平同志旧居”的横匾是当地一位小学教师书写的，门两侧的是老作家马识途撰写的楹联：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首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堂屋里，挂着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

小平同志用过的家具只有两件，一件是可以拆成两半的大圆桌，“文革”中被砸毁了一半，现残存“半边月亮”。少年邓小平曾在这张圆桌上做作业，温习功课。另一件是一张笨重的清代雕花木床，1904年8月22日，小平同志就诞生于这张木床上。

十来间房屋都是空荡荡的，半小时便可参观完毕。

那年初夏，我再度参观旧居时，见便道上、院坝中铺开了席，几个农民正忙着打油菜籽。鸡一群鸭一帮，恬然自得地呼叫着，快活地觅食。

整个旧居，充满川东农村的乡土味，毫无“伟大人物诞生地”的烜赫气势。

县委报道组的王世春告诉我，小平同志曾多次打电话、写信叮嘱有关领导，不要花钱修缮旧居，更不准搞什么纪念馆。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钱要花在人民的事业上。”

但是，三中全会以后，来邓小平旧居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既要尊重小平同志的意见，也要满足参观者的愿望，县政府才决定将百年老屋进行了简单修葺，使参观者大约能看出它的本来面貌。

1998年2月19日，小平逝世一周年，江泽民同志题写了“邓小平同志故居”，从此“旧居”更名为“故居”。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到小平故居的国内外参观者越来越多。德国记者乌利设法在小平诞生的那张床上睡了一夜的消息传开之后，令广安人又兴奋，又有点尴尬。为参观小平故居，让游客踩鸡屎鸭粪，在晒席中曲行，显然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在广安发起“我为小平故里植棵树”的活动推向全国之后，捐赠树苗的来广安植树的人们蜂拥而至。成都一位七十七岁老人白绍成将自己培植了十年的两万棵银杏全部赠送给小平故里，就足够绿化一大片。在新形势下，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牌坊村作出历史性的大搬迁，农户们为邓小平纪念馆园区让出千亩土地。

2004年春节，新落成的邓小平纪念馆对外开放。园区内花木繁茂，曲径通幽，“文革”中被红卫兵炸毁的大清乾隆皇帝赐建的神道碑、德政坊又恢复了原样。

还有翰林院子，是邓氏先祖邓时敏故宅也是小平读私塾的启蒙学堂，经过整旧如旧，从雕花窗棂间，似能听见背诵古文的朗朗书声。

邓小平故居除了比80年代多几件农具、家具外，几乎还是原样。我一直觉得故居有点空。多次参观后，我才觉得：空得好！如果没有故居外的丰饶原野和温暖的炊烟；如果没有亿万农

民越温饱奔小康的自信的笑容；如果没有中国大地二十多年改革的宏伟画卷，故居陈列室里颂扬之词写得再流光溢彩也会显得空洞。

空空的邓小平故居，给人们留下很大的思维空间。

牌坊新村的“老实龙门阵”

与纪念馆隔着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有一大片又具川东民居风格又有现代感的别墅式建筑，这就是牌坊新村。2003年国庆节，三百六十八户农民放鞭炮，敲锣鼓，欢天喜地搬进了水、电、气、路、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八通”的新套房。

我们信步走到“添友农家乐”的院坝。

瘦瘦的杨天友与报社的王世春是老熟人了，一见面就热情招呼。杨天友今年五十八岁，曾当了二十多年的村主任、支部书记。现在是“添友农家乐”的老板。他的父亲与小平同庚，今年满百岁。他说，我父亲跟小平是放牛娃时候的好朋友。我和王世春在他的院坝一坐下来，他就说：“我们今天摆老实龙门阵。”

我最关心的是建房款由谁出，更关心牌坊村失去土地的农民，靠什么谋生？

天友说：“国家赔搬迁补偿，林木补偿，青苗补偿，算下来每平方米补了二百二十元，每平方米自己贴百把块钱，这房子就修起来了。每家大概是一百八十多平方，宽的有二百多平方，最窄的也有八十多平方，够住了。跟原来住的房子完全是两个概念，哪个不喜欢嘛。”

说到谋生手段，他很激动：“出外打工的不说了。在生态农场打工的，在小平纪念馆园区，栽花种树，清洁维修，要用好多劳力呵。还有八十多家客栈，二十多家农家乐，都能挣钱。每天，在小平故居旅游参观的至少上千，遇上大假几万人拥过来，参观完了就到二十多户农家乐来吃饭。我的农家乐从去年9月

25号开张，硬是天天火爆，除了大年初一休息一天，连大年三十都在办席桌。我爱人累得胃出血，住了医院。还有开客栈的，二十元一个床位，最少十五元一个床位，一家有六到八个床位，一个月随便搞个千块钱。住我们牌坊新村，比城里的宾馆空气新鲜，又有风味，安逸得很。说句老实话，现在的牌坊村，只要你肯下力气做，没有生活过不好的。”

么舅的“好福气”

1988年春节，当我见到小平同志的么舅淡以兴和么舅娘杨鸣凤时，我觉得，两位老人能活到今天，真是奇迹。

八十六岁的淡以兴已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和他对话已相当困难。县上的同志向他介绍我是“省上来的作家”。他耳朵背，听不清，只是嘟嘟囔囔：“小平今年咋个还不回来喃？邓垦（小平同志的弟弟）都回来看过我了，他咋个不回来喃？”

当年，小平同志在协兴读初小，与仅比他大三岁的小舅舅一块儿放过牛，一块儿爬上过“神道碑”去玩耍，一块儿下过河洗澡摸鱼，一块儿到乱坟岗去逮过蟋蟀，甥舅俩关系极亲密。

淡以兴老人说：“要说读书，我不如贤娃儿（小平同志上学时曾用‘邓希贤’这个名字），要说耍，我的耍心比他大。”

杨鸣凤老人补充道：“贤娃儿小时候脑瓜灵醒得很，一本书读三遍就背得，考试净得头名。”

其实，两年前——1986年春节，两位老人见到过小平同志。那是在成都金牛宾馆。六十多年岁月流逝，童年的伙伴，亲密的甥舅都成了八旬老人。淡老颤颤巍巍伸出双手，被小平同志紧紧握住。

“舅舅好，舅娘好！”

“小平好，小平好！”舅舅胡子抖索着，瘪瘪的嘴笑开了，露出几颗残牙。

“过年了 给你们拜年 给你们全家拜年。”小平同志风趣地拱了拱手。

淡老汉猛然想起了什么，在身上摸索了一阵，对舅娘说：“走得太慌 你看你看 连压岁钱都没带来 咋个办喃？”

舅舅心目中的小平，是他的晚辈，晚辈给长辈拜了年，按老规矩该给“压岁钱”。兜里忘了揣钱，咋不着急。

小平同志乐呵呵地说：“免，免，你把钱留下，给你的孙孙买糖吃嘛。”

淡老这才松了一口气。

甥舅俩高高兴兴地摆起了“龙门阵”。

舅舅叹道：“那几年（指“文革”十年），硬是把咱们整惨了 你晓不晓得呵？”

小平同志说：“晓得 晓得。”

1966年夏天，北师大红卫兵和广安县的红卫兵气势汹汹来到牌坊村造反。

淡以兴的家被彻底翻了个。红卫兵们乱抄乱砸还嫌不够，又将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拖到两里路外的协兴中学去批斗。当时，红卫兵发明了一种整人的办法：爬街。让五类分子在地上爬。不管是烈日下还是泥水中，淡老汉不得不用肘部和膝盖支撑着身体，跟一大群五类分子一起，爬行在碎石路上。皮磨破了，血渗出来了，痛苦的哀叫使乡亲们心碎！小平同志的所有亲戚都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牌坊村不少姓邓的成年人都挂上了黑牌子。

60年代初，一位副县长信口说：“牌坊村出了伟人，改为伟大村吧。”凭他一句话，牌坊村变成“伟大村”。1966年，红卫兵勒令将“伟大村”改为“反修村”。

人被颠倒，村名被颠倒，是因为历史被颠倒。两位老人总算从颠倒的日子熬过来了。小平同志亲切地问舅舅，这几年还有些啥困难，舅舅坦率地说：“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愁，就是肉嘎儿（猪肉）又涨了价……”

小平同志又笑起来：“我晓得，晓得。从下个月起，我每月多寄五元，好不好？”

解放后，小平同志每月按时给舅舅寄生活补贴费，除“文革”动乱失去人身自由的几年外，从未中断过。牌坊村的乡亲都说：“淡老汉好福气！小平当了那么大的官没有忘记舅舅。”

欧阳晓玲之歌

案头有一部朋友的译著《改变中国》。从深层次讲，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我欣喜地看到，在广安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代全新的农民。他们以行动与实绩刷新了我们的眼球，改变了“农民”这个名词的内涵。荣获全国十佳青年农民称号的欧阳晓玲就是广安新一代农民的代表。

采访欧阳晓玲，正值五一长假，华蓥市举办么妹节那天。因为华蓥山区道路崎岖，年轻汉子用滑杆抬着漂亮么妹上下山成为千年习俗。近年，“华蓥滑杆抬么妹”成为老百姓们关注的民间选美和体育活动。么妹节活动的最后一站，是参观欧阳晓玲公司的千亩黄花梨果园。当十八名仙女般的么妹们簇拥着欧阳晓玲从山上飘然而下时，真让人有点吃惊：这是农民？

欧阳晓玲俊美，洒脱，轻衫薄袖，秀发飘逸。她在弯弯的小路跑上跑下，矫健如小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访欧阳晓玲的节目播出后，观众说，欧阳晓玲模样好，心灵更美。华蓥山的最靓丽的“么妹”当数欧阳晓玲。

她说：“1993年以前，我是永川县林业局的林业工程师。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使我下决心跳入农门。可以说，小平同志是影响了我一生的最重要的伟人。

“农村穷，农业落后，我搞林业调查时就晓得。那些荒山只要与科学技术结合，就会大变样。正因为落后，才给我提供了机遇，让我大显身手。人在最需要你的地方，才能体现你的价值。

“1994年我创办了园艺植物开发研究所，形成了一支骨干队伍，后来在广安代市镇租地二十亩，种黄花梨一举成功，吸引了许多人来参观。禄市镇请我去搞规模开发，1996年，我说服了爱人放弃了林业设计院的工作，一家三口的户口从永川市迁往广安禄市镇。六十多岁的父母也上了月亮坡来，一家人投入了开荒种地的大生产运动。

“开始，农民的眼光还充满怀疑，城里人会下了户口搬到山上住，有那么瓜的人嗦？他们看见我的娃娃背着书包上村小，研究所搬到山坡上的临时工棚里，我们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渴了喝山水，饿了啃馒头。从山脚挖到山顶，连片开垦了二十个山头，怀疑的目光变成了信任的目光。一年苦战，建成了一千亩黄花梨基地。由于水池没完工，没得水浇苗木，我们只好抬着十二台抽水机，从山下小河沟抽水。坡又陡距离又长，我们只好抽一站打个坑垫上塑料布做临时水池，一站接一站往上抽，为抽水，我四天四夜没合眼。

“那年大年三十晚上，爱人小范在外地办事没有回来。爸爸妈妈见我没回家，打起手电摸索着上山找我，一连翻了三个山头都没有找到，他们就喊，也没有喊答应。又翻了一个坡，看到我还在挖坑，老两口心疼得没法说，一边流泪一边帮我挖坑，把最后几棵树苗栽完……”

“我们公司现在已在广安、南充、岳池、华蓥连片开发荒山瘠地，建成了优质水果基地五千亩。我觉得，我这几年最成功的还不是出了多少万斤水果，更重要的是我摸索到一种模式，带动农民致富的模式。我以按当年价每亩五百斤到九百斤的玉米、稻谷的价格租赁农民的土地三十到五十年，农民成了既不担市场风险又不担自然风险，旱涝保收的‘小地主’。同时，我又以每天十到二十元的工资聘请农民做工，使农民变成‘农业工人’。我带领了一千多农民脱贫致富，人均每人增加一千二百元收入，最高的农产年收入超万元。”

当说到曾经有过的“走麦城”的经历时，她说：“刚筹办果树研究所时，做生意亏损了十八万元。在最困难的日子，我想到过卧轨自杀，了结一生。

“我从小爱读名人传记，崇拜英雄。我想到，小平同志三落三起，就像一部交响乐，有起伏跌宕反而使他的一生更丰富更精彩。在‘文革’十年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容易吗？他所承受的政治的、精神的、身体上的压力有好大呵。我是小平故乡的女儿，只要一丁点儿小平同志那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苦果子嚼不烂，吞不下？

“想到小平，我来了劲儿。走！只要活一天，人生的路就得走下去。与其哭着走，不如笑着走！”

结束采访，已经是后半夜。晓玲的眼睛仍炯炯有神但嗓音已嘶哑。她说，是开发月亮坡时得了化脓性扁桃炎，拖了一个多月，又休息不成，硬是把嗓子整坏了。原来，我好喜欢唱歌呵。可惜，现在唱不成了。

我说，你的花果山天天在为你唱歌。

龙廷安的难忘之夜

1976年春天，发生在广安的大饥饿没有把硬汉子龙廷安击倒。

他说：“我能吃苦。梧桐树皮、芭蕉莛莛、观音土、麻红苕都咬得动，嚼得烂，吞得下。特别是‘麻红苕’，其实是黄麻根根，最难吃。吃了嘴巴麻，舌头麻，人都要发木，我还吃，把一点点粮食给老人细娃儿吃。”

如今，这位城郊奎阁乡的农民已是安德集团广安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安得”二字取意于杜甫诗句。在龙廷安的名片上，有一行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居家经商俱欢颜。”龙廷安正以大手笔为广安立下两大建筑，一是斥资二点五亿建龙马商

场；二是斥资三点八亿建果丰小区。

没有大董事长的气势，没有豪华的大办公室。

眼前是一位个子不高声调不高的汉子，一张饱经风吹雨打的黧黑面孔，沉思时半眯着眼睛，透出过人的精明。在他整洁简朴的办公室，在多次接电话的间隙，他接受了我的采访。

经理桌上有两样摆设很扯人的眼睛。一件是市政府和市工商联赠给他的“华尔街牛”，这是矗立于纽约股票交易中心街头著名的华尔街牛的复制品，底座上有一行小字，祝愿他“永远保持牛市心态”。

他谈到了他经历过的许多个不眠之夜。但最动情的是那一个晚上。

1997年2月20日早晨，忙了一个通宵的龙廷安准备好材料，去南充敲定兼并东方贸易公司的事。

小车向西疾驰，他准备打个盹，耳边传来了哀乐声。他让司机打开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正沉痛宣告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

如五雷轰顶，龙廷安一下子呆了。过了好久，他吐出三个字：回广安。助手提醒他，我们该去南充，确定八百万元的大项目呵。

他说，邓爷爷死了，今天哪个龟儿子还有心情谈生意？

回到广安，他带领全家来到电影院。在电影院的人厅里，民间自发组织的吊唁活动正在默默进行。他一直低着头，不敢看那一双双泪眼。

沉重的脚步走向小平故居。那里，花圈和挽联挤满了院子。他指着小平曾经睡过的床，对儿子女儿说：“小平十五岁离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这一辈子都在为我们操心呵！”

春寒料峭，阴云密布，广安在哀乐声中恸哭。

龙廷安在家中设下了灵堂，鲜花，松柏，香烛，供奉在小平像前。从深夜到天亮，他独自守着闪动的烛光，为小平守灵。

望着小平的像，他禁不住热泪滚滚。他说，我心头跟小平同志说了一晚上的话。

“小平同志，这些年来，听你的讲话，学习中央的政策，我觉得，你就像是把我们的心的心都摸透了一样，你为全中国的老百姓着想，巴心巴肝为农民着想，看不到方向的时候你给我们指方向；没得主意的时候你给我们出主意；胆气不足的时候你给我们壮胆，没得你老人家撑腰，我们哪敢放心大胆地挣钱？哪个敢丢心落肠地走致富的道路？过去好多年，我这个吃过观音土，啃过树皮的农民，只想有碗白米干饭吃，细娃能读个小学，写得起自己的名字就是最大的理想了，哪想到这辈子还会过上这么好的日子，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呀！我到沿海地区考察学习，反复对照才晓得，你为我们中国画了好大一幅蓝图呵，你老人家奋斗了一辈子，劳累了一辈子，为我们老百姓受了那么多磨难，让我一想起就心痛呵！”

他说，哪个亲人死了我都没有那么伤心。我一辈子硬是没有那么哭过呀！

2001年，在广安市工商联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的文艺晚会上，龙廷安和一批民营企业家发起了“我为小平故乡植棵树”的倡议。得到市委书记谭力的赞许。全市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响应又“波及”全国。如今，北京的国家机关和全国各地来广安的旅游者种树造林，使小平故居成了绿树之海。

临别时，我感谢他接受了采访。因为，他曾婉拒了多次采访，不愿意上报上电视。他说，细细想来，小平教了我好多。小平这个名字本身就很低调，体现了他只做实事不张扬的个性。他说的“韬光养晦”，教我低调处理荣誉，夹着尾巴做人。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摔过大跟斗，都是因为我从小平的教导刻在心坎上。

又谈到他引以自豪的儿女。他说：“我们这一代人运动搞得太多书读得太少，被耽搁了。我们的儿女不能再吃文化方面的亏

了。要有文化，有眼光才能办大事，这是小平教我们的。我们广安过去那么穷，属于偏远的地方，都相当鼓励娃娃多读书。搬起手指头算嘛，小平出国那几年，我们小小广安县就有三十六个学生留学法国、日本和比利时。你说，小平要不走出四川，不走出国门，不把东方西方欧洲苏联都看透彻了，会成为世界伟人么？”

我感觉得到，邓小平的理论和思想，已经鲜活地融会在这个中国农民的血液之中。

漫步思源广场

2004春节，有多对新人在东门码头举行婚礼。早春的阳光，照耀着他们幸福的笑脸。东门码头是小平投身革命的光辉起点，新人们希望东门码头成为他们崭新生活的扬帆处。

一路走去，思源大道的东头是占地一百二十亩的思源广场。广场上灯火辉煌，游人如织。经过音乐喷泉拾阶而上，是一大台阶，台阶上是小平手书，青铜浮雕的一行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台阶上还镌刻着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工作讲话全文。

五粮液酒厂赠给广安的铸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青铜宝鼎，重达四十二吨，屹立在大台阶的最高处。

凝视宝鼎上“实事求是”四个字，王世春说：“广安的老同志特别赞赏宝鼎这个创意。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也是广安的历史的教训。”

漫步思源大道，仿佛能听到世界的声。

2000年冬天，我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听一位老牧师讲邓小平，讲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令我吃惊。原来，小平同志曾两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以至于在美国家喻户晓。

我多次听到包括宇航员在内的俄罗斯朋友盛赞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说：俄罗斯缺少邓小平那样有智慧的领导人。

在思源大道上，我与广安市委书记探讨理论问题。因为他的

名片上写着：谭力教授。他有一部行政管理方面的专著，在学界颇有影响。

他说：“中国二十多年改革的成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就明明白白写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才敢给五类分子摘帽，给右派分子平反，解放了那些分子和他们成千上万子女，调动了很多人的积极性；实事求是，才敢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实行联产承包制，承认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才敢发展民营经济；实事求是，才有在小康路上大步前进的中国！”

此时，华灯初上，思源广场上的宝鼎闪耀着一片光芒。

原载《文汇报》 2004 年 8 月 15 日

永远的红树林

何建明

—

那是什么？远处的一条江河入海处，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这是红树林。你折一根看看它们的心，红的吧！它因此得名红树林。别的地方不会有的，红树林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大多集中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它对保持大陆岸架免受海水侵袭的作用可不一般呐！”

原来，汹涌的大海与郁葱的大陆之间能够保持如此的和谐与平衡，竟然是红树林的功劳啊！“边缘地带”的学科为什么总能推动我们这个星球往前？奥妙也许就在于此。青年学者梁言顺激动了，他为这观海中不经意的发现而激动。

1993年，一位青年学者走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苏星教授的身边，成为苏教授的博士生。苏星教授在中国的理论界无人不